

台湾社会“统独”意识消长成因及发展新态势

李文艺 周丽华*

台湾社会存在的“统独”意识是构成岛内“统独”矛盾的要素之一,而“统独”矛盾的变迁既是观察台湾民意走向及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也是考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长期趋势时不得不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台湾学者施正锋援引西方政治学的解释也认为,意识的产生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原生论认为人群的集体认同建立于有形文化或是自然的生物特征上;结构论认为集体认同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不满自身在政治权力、经济财富或是社会地位上的分配不公,而血缘或文化的特色只是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建构论则坚持集体认同都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强调共同历史、经验或记忆等才是决定认同的关键。^[1]笔者认为,台湾社会现今存在的“统独”矛盾不是孤立的,既有其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是当政者对台湾社会意识高度选择性重塑的结果。具体而言,台湾社会“统独”意识的产生和异化,“统独”矛盾的形成和变迁,既与台湾固有社会结构下“本土化”、民主化发展直接相关,也与李登辉、陈水扁推行的分裂路线密不可分,在选举利益的诱导下,“统独”矛盾裹挟着族群、省籍因素,成为影响岛内政治生态,制约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从台湾社会“统独”意识的历史成因入手,分析岛内“统独”矛盾产生消长的主要原因及发展变化趋势,阐述其对岛内政局及两岸关系的影响。

一、根源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统独”意识

“统独”意识是指台湾社会对于现存或未来的政治地位及其主权归属的态度,由于台湾政治定位的模糊不清以及岛内“国家认同”的异化,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民众对台湾前途的不同立场,构成台湾社会“统独”意识,而“统独”意识的歧见,逐渐演绎为台湾社会“统独”矛盾,成为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一) 认同分歧:两种意识的分立

岛内主要居民是历史上从大陆迁居过去的汉族人,长期以来,“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本不对立,“台湾意识”萌生于台湾人爱乡土的朴素情感,属于统一国家中的地方意识。具有浓厚台湾人集体认同色彩的“台湾意识”发端于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当时的“台湾意识”既是民族意识又具阶级意识。抗战胜利后,台湾人回到祖国怀抱的欣喜,很快被国民党“劫收”部队的腐化及“二二八事件”的血腥镇压一扫而光,“台湾意识”逐渐转化为台湾人要求民主化、本土化,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省籍意识。随着政治动员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岛内民众形成的“特殊集体记忆”深化了台湾人的自我认同。“台湾主体意识”基于台湾特殊的历史,被重塑形成所谓“台湾人集体记忆”,实质是对“台湾意识”的刻意误读和固化,它凭借“台湾意识”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族群结构,突出台湾主体性,模糊并企图隔断“认同台湾”和“认同中国”两种认识的联系。^[2]有学者研究指出,当前台湾民众的政治情感突出表现为“叛逆”心理、“悲情意识”、“恐共心理”和“媚日崇美”倾向。^[3]在对待两岸关系上更背负着“弃儿情结”、“争出头天”、“认同西方制度”的思想包袱。^[4]在这样的政治情感驱促下,“台湾意识”具有较明显的两面性,爱国性、反抗性、自主性是其较积极的方面,抱怨性、排他性、分离性则是其狭隘消极的一面。

“台湾主体意识”的核心是认同问题,由地缘认同上升到共同体认同再到所谓“国家认同”,并与台湾的

* 李文艺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浙江台湾研究会助理研究员;周丽华为浙江台湾研究会秘书长。

主权地位相联结,坚持“主权独立”成为“台湾主体意识”的核心内涵。^[5]“台湾主体意识”弱化了台湾社会对“中国意识”的认同,形而上地将政治认同从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国意识”的整体认同中剥离出来,形成“统”与“独”的意识分歧。近年来,“台湾主体意识”更被有心人士加速建构,其社会基础不断扩大。

(二)“统独”意识:动态平衡与现实取向

“统独”意识反映台湾社会针对台湾政治地位的倾向性看法,揭示出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和期许。总体上看,岛内“统独”意识呈现出两方面动态变化特征。

其一,台湾社会对“统独”现状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统独”光谱总体处于动态平衡。岛内民调通常选用“尽快统一”、“维持现状以后统一”、“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永远维持现状”、“维持现状以后独立”、“尽快独立”的“六分法”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是“极统”、“极独”分别为少数,维持现状的人始终占据“统独”光谱中的主要部份,“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已延续多年^[6],近年来选择广义“维持现状”的人数呈增加趋势。事实上,民调较难准确反映民众的“统独”立场,原因在于不同个体或政党对于“统独”以及维持现状三个基本选项的理解不尽相同,鲜有交集,民调问卷题目几乎又都回避注解“维持现状”的具体含义。总体而言,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泛绿”势力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维持现状就是“独”;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泛蓝”坚持“中华民国”宪法,但也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陆方面则认为两岸是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故主权没有分裂。由此可见,对维持现状内涵理解的不同,也会导致民调反应的“统独”民意无法真正体现民众的“统独”意识,所以才会出现吊诡的现象:反对“台独”的人数远高于支持“台独”者,但若问到这些反台独者是不是支持统一,绝大多数都会予以否认,说自己是赞成维持现状,但不是统派。^[7]即便是赞成维持现状再独立的人,他们中间大部分仍受利益导向,希望有条件就“独”,没有条件就不独,“独”不是最重要的目标,和平和安定是首要目标。

其二,民众“统独”立场受时势变动影响明显,总在理想追求与现实利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台湾民众的“统独”意识不是静态不动的,而是随着两岸关系和大陆政经局势的发展、岛内政治势力的消长及国际政治等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台湾民众的“统独”倾向受政治认同左右,带有浓厚理想化的色彩,同时又受外界客观形势变动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易感性和脆弱性。^[8]而且,依民众本身社会经济地位、族群、年龄结构和地区等差异,“统独”观念存在差别。

(三)社会转型:“统独”矛盾显现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为把台湾打造成“反攻复国”基地,经济上努力作为,政治上独裁高压。蒋介石政权以“中华民国”法统为基础,在国家层面,贯彻单一的“中华民国”符号体系,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个省,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台湾新兴的中产阶级迫切要求政治转型,在争取自由民主的过程中以族群反抗和民主抗争作为相互呼应的政治诉求,很自然地把本省人当家作主的要求提升为最主要的政治动员口号。在岛内中下阶层看来,寻求政治解放,首要目标就是向外省人夺权。于是,民主化、本土化这两个在学理上本不直接相干的政治诉求,成为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之“—体两面”,本土化成为民主化的本质要求和必然结果。台湾人要求当家作主的“台湾意识”随之高涨。时任领导人蒋经国以“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的观察,^[9]逐步推出“革新保台”政策,并“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加速了岛内本土化、民主化进程。后蒋经国时代,“台湾意识”被逐渐误读为“台湾主体意识”,并被异化为虚幻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统独”意识逐渐演化成台湾社会的“统独”矛盾。

二、“统独”矛盾形成激化的政治动因和发展新态势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大量的事实表明,李、扁时期强化的意识形态和“去中国化”政策极大地激化了岛内民众的“统独”对立情绪,被当权者强力重塑后的价值观又对台湾社会造成新的结构性破坏,“认同台湾”与“认同中国”对立俨然成了身为台湾人的基本判断。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马英九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缓和了台海局势,“统独”意识被淡化,“统独”矛盾也得到了—定

程度的缓解并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一) 李扁时期“统独”矛盾凸显并激化

李登辉主政,为完成向“非主流派”的全面夺权,借力“本土化”,“弱化、裂解两蒋留下的国民党”^[10]及其体制,从思想理念上侵蚀国民党的“中国”概念,松动了民众对“一个中国”的思想根基。为实现其“独台”分裂路线,一方面,李登辉或明或暗地扶植“台独”力量;另一方面,李登辉推动大幅“修宪”,企图台湾“独立”奠定事实和法理基础。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公然将两岸关系定位为“特殊的国家与国家关系”。^[11]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李登辉发表“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谈话^[12],挑起与大陆的敌对;编写篡改历史的“认识台湾”教科书,把“台湾意识”绝对化,为“台独”路线制造舆论。

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上台伊始,为稳定局势,缓解大陆及国际社会的压力,提出带有欺骗性的“中间路线”,承诺“四不一没有”^[13]。待其政权稳定后,为巩固基本盘,压制泛蓝势力,开始推行“台独”分裂路线,并由“缓独”走向“急独”。他提出“一边一国论”,亮出“台独”目标底牌,主导“修宪”,通过《公投法》,为实现“法理台独”铺路。连任之后,更加有恃无恐,挟持民意搞民粹,加速“台独”步伐,挑起族群对立和政党恶斗。此外,他还采取一系列“文化台独”、“去中国化”的措施,企图从思想上、文化上、历史上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强化“台湾主体意识”、宣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扩大“台独”的社会基础,社会严重对立,“统独”矛盾空前激烈。执政后期,更是强力推行“台独”路线,大有策动“统独”对决之势,在他的操弄下,岛内“统独”矛盾迅速激化,台湾社会严重撕裂。

(二)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统独”矛盾得到缓解出现新态势

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开始执行一条缓解台海危机、发展两岸关系的新政策,两岸也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协商,岛内“统独”矛盾有所缓解并呈现出新的态势。

1.“统独”矛盾有所缓和并呈现隐性特征。马当局为兑现选举政见,弥合政党矛盾,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缓和“统独”争论,“统独”矛盾暂时呈现隐性化发展特征。

首先,马英九当局不再激化“统独”矛盾。马英九公开宣示“不统、不独、不武”的大陆政策,并以在“九二共识”为基础“先经后政”发展两岸关系。马英九的态度和做法,迎合了希望维持现状、顾虑两岸统一的民众的想法,获得了台湾民众的高度认同。马英九的政策引导,降低了民进党攻击的正当性,客观上有助于缓解岛内“统独”争议,使得岛内“统独”议题不再成为台湾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2009年底的“三合一”选举和2010年的“五都”选举,“统独”议题均未充分发酵,都显示“统独”矛盾暂时隐性化。

其次,马英九当局在文化教育领域逐步纠正李、扁时期“去中国化”政策。马英九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降低“去中国化”的危害,如规定“驻外使馆”公文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称“中国大陆”或“大陆”;将陈水扁时期的通用拼音改为汉语拼音;^[14]“教育部”任命具有统派色彩的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王晓波教授为“历史课纲”修订小组召集委员,研拟修改“98高中历史课纲”;马英九还亲自参加台北市孔庙的祭孔大典,主持遥祭皇帝陵典礼等等,表达了对中华民族远祖的崇敬。2011年马英九元旦讲话,再次强调加强文化在促进两岸关系中的特殊作用,提倡两岸以文化为纽带的深度交流。^[15]这些反“去中国化”的措施虽然不能立即改变台湾民众业已形成的“统独”意识现状,但执政当局努力凸显中华民族历史的血脉传承以及中华文化与台湾文化的渊源联系,显然有利于化解“统独”矛盾,摆脱“去中国化”政策造成的阴影。

第三,两岸大交流压缩了“台独”的发展空间。经过两年多的和平发展,两岸大交流的格局已然形成,交流的层次、领域和高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2009年以来,已有200多位大陆省部级领导赴台参访;多个省市领导率庞大代表团赴台交流、采购,体现了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的善意,也有助于台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另据统计,2009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数达60.61万人次;2010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数成倍增长,达到122.81万人次。^[16]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岸民众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交流,拉近了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两岸大交流增进了两岸民众的了解,降低了长期以来民进党负面宣传的效果,极大地压缩了“台独”的发展空间。

2.“统独”意识存在的社会基础尚未发生根本变化。马英九上台后采取积极的两岸政策也充分显示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代表了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获得台湾民众普遍认同,但是岛内对“台湾主体意识”的认同度仍然居高不下,“台独”社会基础尚未根本动摇,“统独”矛盾仍将长期存在。主要表现在:

一是“台独”基本盘及分裂主义思潮没有发生动摇。始终没有放弃“台独”政策宣示的民进党在岛内仍拥有四成左右的基本盘,“台独”思想在台湾社会还有一定的市场,2010年“五都”选举,民进党总得票率逼近五成且领先于国民党,说明“台独”分裂势力仍具有较强的政治动员实力。^[17]对比有关民调中“统独”光谱的两端,可以发现主张“台湾独立”的比例高于主张“两岸统一”的比例,且呈现逐年扩大之势。

二是通过交流扩大“中国认同”需要一个过程。当前,台湾仍有一部分人,罔顾两岸和平的大好局面,把两岸交流中出现的偶然摩擦和意外冲突,放大成“中国打压台湾”的效应,挑起岛内民众“仇中、反共”的情绪。因此通过交流的深入和扩大,能够缓和原有的对立情绪并拉近两岸民众的感情和距离,但台湾民众“中国认同”需要一个长期建构的过程。

三、“统独”矛盾变化对岛内政局及两岸关系的影响

在国民党重新执政的新形势下,“统独”矛盾趋缓且呈隐性化,不再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但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并没有消失,“统独”议题仍将是影响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对岛内政局的影响

长期以来,民进党通过唤起族群集体悲情记忆来动员群众,将其固化为“基本盘”。每逢选举,蓝绿严重对立,民众不得不承受“统独”意识分裂及政党恶斗所带来的恶果。随着岛内“统独”矛盾的趋缓,降低了民进党操弄此议题的能力和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岛内政局的发展方向和催化两党制的政党政治的建构。

首先,民进党“台独”诉求对选民的影响力下降。民进党利用政权优势仍无法有效推动“台独”,说明“台独”没有“前途”,而“五都”选举中采取相对温和理性的诉求,反而提升了得票率。这些都说明民众在经历两次政权轮替后逐渐回归理性,民生政策、经济发展正在成为民众衡量政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标准,这反过来有助于缓解“统独”矛盾,冲淡“台独”诉求的能量。

其次,民进党的传统选举工具趋向弱化。“统独”牌曾是民进党选举动员时的重要武器,但陈水扁的贪腐形象和对“统独”议题的过度操弄使民众对此产生了厌恶情绪。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与福祉,“统独”牌效应下降,使民进党传统选举工具的功能被弱化。

最后,催化“两党制”政党政治的定型。当“统独”不再是选举最为重要的议题时,民生政策和理性的大陆政策逐渐成为选举的焦点。为赢取选举,在民生政策和理性大陆政策方面,两党的主张将会逐渐趋同,而选民在“统独”意识不占主导地位的选择时,其投票行为愈趋理性,以当前台湾政治体制的客观现实,两党轮流执政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都将成为常态,间接催生两党制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巩固。

(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岛内“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主流民意相吻合。当前,“统独”矛盾虽然仍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变数,但其被弱化、被缓解,既有益于扩大岛内的主流民意基础,也有利于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既有利于台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也有利于延长大陆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首先,有利于巩固“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岛内多数民众希望维持现状,“急统”、“急独”均是少数民意,“统独”矛盾暂时得到缓解,有利于巩固“两头小、中间大”的民意现状。立足现在才能改变未来,经过和平发展阶段的演绎和催化,一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真正普遍地惠及台湾百姓,支持“台独”民意会逐渐缩小,在民意经历新一轮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后,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会更加牢固。马英九当局的两岸政策,获得近六成民众支持,这种民意的持续增强有利于国民党巩固执政基础,促使当局继续出台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政策,从而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使两岸关系迈入良性互动的轨道。

其次,有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岛内“统独”矛盾暂时得到缓解,“台独”高危期结束,台海局势趋于稳定,两岸获得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机遇,这有利于延长大陆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两岸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后盾,有利于台湾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台湾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第三,台湾问题国际因素的影响将大幅下降。两岸关系紧张,给美日等少数国家插手台湾事务、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过去十几年时间内,因为岛内有“独”的意识和冲动,很容易与国际因素相结合,内外因素结合,屡屡造成台海危机的爆发。当前,影响台海局势的大陆、台湾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势力三方面最主要的因素,因大陆综合国力提升和推动和平发展两岸关系政策,台湾经历“八年乱政”后,进入反思调整阶段,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国力衰退,包括庞大国债以及诸多国际问题在内需要得到中国大陆的支持和配合,本身介入台海事务的实力和动力不足,而岛内“统独”矛盾缓解,也让支持“台独”的国际力量失去了合理的着力点,美日等国“以台制华”的策略力道大大下降。

四、理性认识岛内“统独”意识与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统独”矛盾在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理性看待“统独”意识和“统独”矛盾的关系,有利于更好理解台湾民意,推行更加符合台湾民众福祉、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进而逐步消除台湾民众中“独”的意识,扩大“统”的基础,最终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

(一) 准确把握台湾主流民意与“统独”意识之关系

主流民意与“统独”意识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发展变化。在对待台湾前途问题上,大多数台湾民众选择维持现状。从主张“统一”的立场出发,广大的维持现状的民意成为了“统一”的阻碍者;从“反独”的角度出发,大陆站在台湾“统独”民意中多数的一边,维持现状的民意又是大陆反对“台独”立场的支持者,我们需要巩固这部分民意。民众在“统独”议题摇摆不定的立场说明现实条件的变化会导致选择差异,而差异的调整同样也可以借助现实条件的改变来实现。“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的台湾主流民意,与大陆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目标有极大的共性。和平发展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轴,以台湾民众福祉出发,搁置争议,积极推动两岸各项交流,逐渐将台湾民意推向“渐统拒独”的方向,方能扩大实现统一的民意基础。

(二) 台湾“统独”矛盾将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从“统独”意识的社会基础看,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将长期存在,长期以来影响两岸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如“一个中国”的含义、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台湾的国际空间”等问题短期内也难以解决。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深入,低敏感度的议题逐渐得到解决,高敏感度议题将是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两岸会谈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新的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增高。与此同时,两岸官方和民间的互信基础都显不足,任何两岸间的矛盾冲突,包括在国际场合发生的意外“插曲”,都易被放大和误导为大陆对台湾的敌意和打压,进而影射到民众的“统独”意识。台湾在两个主要政党竞争格局下政党轮替已是常态,不能排除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在民进党未来走向执政的过程或执政期间,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引爆“统独”矛盾甚至激化“统独”矛盾,引发台海危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对“统独”矛盾的长期性和危险性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三)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缓和“统独”矛盾的有效途径

“台独”意识高涨需要环境配合,如果两岸民众断绝往来,互相仇视,各自陷入极端的意识形态中,那么“台独”意识就有土壤、有营养,必能蓬勃发展。“统独”矛盾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某种程度上讲,民众是被迫参与的,他们更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现实利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民众的福祉。两年来马英九当局的大陆政策,为缓和岛内“统独”矛盾所做出的努力,获得了台湾民众的普遍认可。台海稳定为台湾赢得发展经济的机遇期,经济发展了,重新站上了快速增长通道,睽违已久的景气好转为执政当局改善民生提供了物质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统独”矛盾的政治动因,弱化了“统独”意识存在的社会基础。

五、结语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实际上是两岸相互争取民心的博弈过程”。^[18]消除“统独”矛盾取决于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关键在于争取台湾民心对两岸和平统一的认同。只有正确认识台湾社会的“统独”意识消长的历史和现状,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台湾民意走向,从而逐步消除台湾民众的误解,引导民意,拉近民众的心理距离,巩固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

从“反独”的角度来看,大陆站在台湾“统独”矛盾中多数民意的一边,完全可以把握“反独促统”的主动权。既然两岸长期隔离是造成台湾社会“中国认同”弱化的重要原因,当局的政策又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社会意识流的发展方向,那么“统独”意识就同样具备加以正确引导的可能。目前,两岸应积极珍惜和利用当前两岸发展的大好局面,发挥智慧,加强包括文教、媒体在内的各项交流,在把握原则的基础上搁置和减少争议,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巩固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引领台湾民意,主导台湾社会的价值判断。使两岸和平发展期成为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过程的必经阶段,完成“化独促统”的历史任务。

注释:

- [1] 施正锋:《台湾意识的探索》,《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 60-61 页。
- [2] 黄俊杰:《论“台湾意识”的发展及其特质》,《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 1-29 页。
- [3] 刘国深:《当代台湾政治分析》,九州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 36-45 页。
- [4] 李逸舟:《关于对台决策思维战略调整》,中国台湾网 2009 年 12 月 22 日。
- [5] 陈星、相靖:《“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性解析》,《台湾研究优秀成果获奖论文汇编》,九州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第 30-32 页。
- [6] 相关统计数据见台“行政院陆委会”网站(<http://www.mac.gov.tw>)及《联合报》系民意调查中心。
- [7] 《土生台湾人逆流喊统一》,香港《明报》2002 年 10 月 2 日。
- [8] 中评社 2010 年 1 月 28 日转台湾《旺报》社评。
- [9] 宋楚瑜:《贴身随侍 14 年 亲历蒋经国改革之路》,人民网 2010 年 11 月 3 日转载自《文史春秋》。
- [10] 毛铸伦:《民进党执政八年重灾思痛》,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2008 年“八年来台湾政治发展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11] 何振忠:《李登辉: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台湾《联合报》1999 年 7 月 10 日。
- [12] 李登辉在 1994 年同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4 月被台湾媒体全文刊出。
- [13] 陈水扁就职典礼致词:《台湾站起来——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时代》,台湾《联合报》2000 年 5 月 21 日。
- [14] 《两岸关系大事记》,中国网 2009 年 1 月 9 日。
- [15] 《马英九“中华民国百年元旦”讲话预示两岸关系今年“由经济转文化”》,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2011 年 1 月 2 日。
- [16] 《去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逾 122 万人次,同比增 102.6%》,新华网 2011 年 1 月 14 日。
- [17] 《台五都选举国民党赢三市 总得票率低于民进党》,新华网 2010 年 11 月 28 日。政党总得票率方面,国民党 336 万 9052 票占 44.54%,民进党 377 万 2373 票占 49.87%;前者在北二市优势明显,后者则在南二市领先。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 422692 票,占 5.59%。
- [18] 周志怀:《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的挑战与动能》,全国台湾研究会《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论文集 2010 年 6 月。

(责任编辑 毛仲伟)